

# 社会主义模式是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影响的关键

王宏波、陈建兵在《山西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撰文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具有世界性普遍影响,具体表现在影响范围的广泛性、影响内容的深刻性、影响时间的持久性。普遍性与多样化并存,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影响的特点。当前学术界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同视角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普遍性影响与多样化形

式并存问题。

这主要有四个视角:第一个视角,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认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第二个视角,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认为人类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问题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和目标追求;第三个视角,马

克思主义是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理论,认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第四个视角,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特殊的现代化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具有传播市场,根本上是由于这些落后国家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模式。

其实,社会主义模式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不同国家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晶,是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影响的关键。从世界眼光和历史视野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具有广阔前景,当前重点应是加强社会主义模式问题研究,探索适合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

(摘自《新华文摘》)

## 孔子编订《诗经》新证

张中宇在《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撰文指出,《左传》记载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周乐”被视为孔子之前《诗经》已经编定的“铁证”,因为鲁国乐师演奏的风、小雅、大雅、颂的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一致,但季札观的是“乐”,舞,而不是听“诗”朗诵。从《国语》、《左传》引“诗”分布及出现时间来看,“诗”与“雅”关系极为密切,“雅”可能为中国早期一般意义上的“诗”;此后地方之“风”逐渐具备与“雅”并列称“诗”的地位。“颂”一直具有相当特殊的地位与独立性,很可能早有单独文本流传,应最后整理编入“诗”。“风”地位的上升与“颂”逐渐融入“诗”这一过程的完成,为雅、风、颂合流,进而编订综合性诗集提供了心理准备与社会条件,其时间当在春秋中晚期,即孔子所生活的时代,不可能更早。孔子极可能是中国第一部整理成型的“诗”的文学文本的最后整合及编定者。孔子编定《诗三百》有三条重要内证:第一,“思无邪”是孔子明确的选编思想;第二,孔子是第一个称“诗三百”的,也是到他生活的时代为止唯一称“诗三百”的;第三,《论语》记载孔子批评“郑声淫”、“恶郑声”、“放郑声”,可知当时社会上流传大量露骨的郑声,但《诗三百》中并未保存所谓“淫诗”,从一个侧面证明《诗三百》经过了在统一编辑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严格甄选。而且孔子也是最早把文学从音乐中以“文本形式”分离出来的人。

## 管仲生卒年考

王京龙在《济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撰文指出,20世纪后半叶以来,学术界对于管仲的生年一直争论不休,悬而未决。管仲的卒年不成问题,文献明确记载是公元前645年。关于生年问题,目前的说法主要有三种:其一,公元前723年说,即管仲生于公元前723年农历五月初五日,可以称之为“颍上说”;其二,公元前735年说,即管仲生于公元前735年6月6日,农历五月初一日,可以称之为“淄博说”;其三,公元前716年说,此说见于青溪崇本堂本《管氏宗谱》,可称之为“宗谱说”。综合各种观点,认为管仲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伟人,我们现代人的确有确定其生年的必要,但依据某种传说来考订的办法有所欠妥。既然管氏的宗谱有所世传,且又大致符合历史事实,不妨就可以此为依据,确定管仲生年为:周桓王乙丑年(公元前716年)三月初三日巳时,卒于周襄王丙子年(公元前645年)十一月十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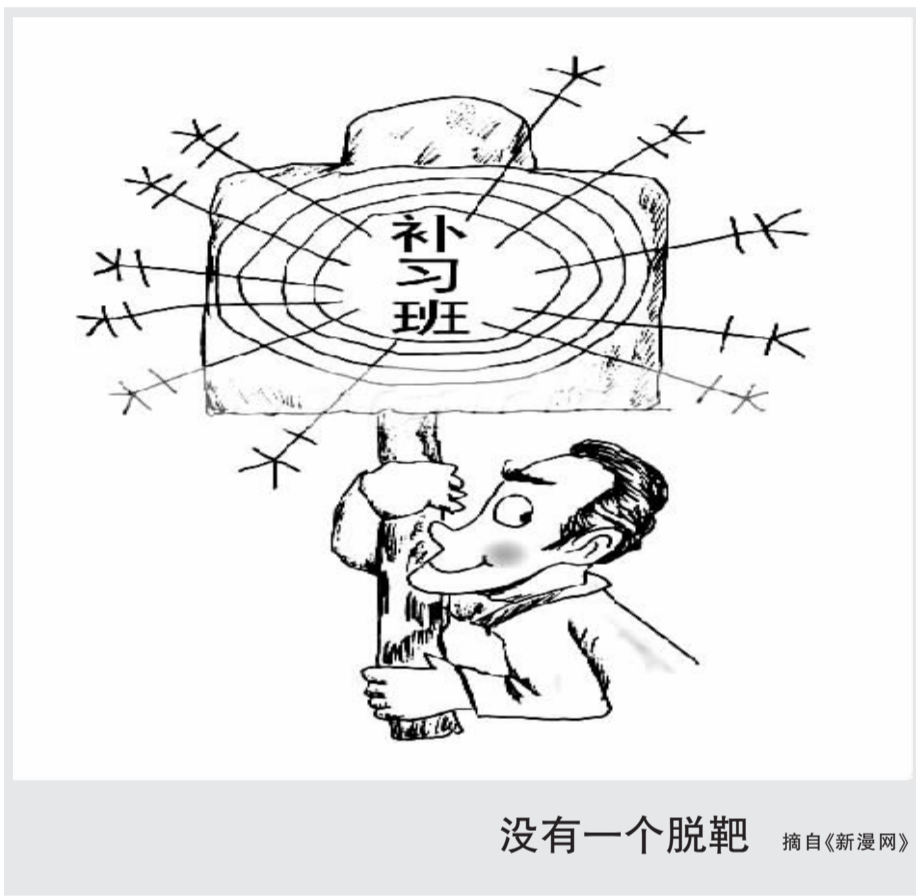
## 七言诗并非起源于楚辞体

赵敏俐在《深圳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撰文指出,七言诗源于楚辞体,是现代学术界大多数人的看法,其中一个重要材料就是沈约《宋书·乐志》中录有《今有人》一诗,是由《九歌·山鬼》改写而成。但是,两首诗之间的改写关系不能看成是两种文体的演化。从本质上讲,楚辞体与七言诗是两种不同的诗体,后者不可能是从前者演变而成。楚辞体在汉代沿着两条路线发展,一种是以楚歌的形式和骚体赋的形式继续存在,一种是变为散体赋中的六言句式,而七言诗的产生自有其独立的过程。在中国文学史上,各种文体在形成过程中受其他文体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小说与戏曲、诗与词、词与曲之间都有影响关系。但是在进行文体影响研究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比较双方在表面形式上的异同,更要关注不同文体之间的本质特征。从音乐上来讲,楚辞体与七言诗存在二分节奏与三分节奏的巨大差异,从语言结构上讲,则是句首的一个“三字组”与两个“二字组”的差异。从《山鬼》到《今有人》的改编实践说明,从楚辞体中不可能自然演变出七言诗来的。

(摘自《新华文摘》)

## 资源型城市发展的战略思路

张汉飞在2008年6月2日《学习时报》撰文指出,资源型城市转型问题已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成为我国新世纪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资源型城市转型应该切实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粗放是制约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打破能源、资源和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切实提高资源型城市经济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才能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因而,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战略思路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经济转型要与产业结构升级结合起来,经济转型要与就业和再就业集合起来,经济转型要与发展战略转换结合起来,经济转型要与管理升级结合起来,经济转型与环境改造结合起来,经济转型要与技术改造结合起来,经济转型要与人才结构升级结合起来,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融合贯彻科学发展观,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城市经济将会步入新的发展轨道,也必将开拓经济转型事业的新局面。(摘自《新华文摘》)



没有一个脱靶 摘自《新漫画》

## 观点集锦

### 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基本要素

刘实在日前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在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过程中,可以借鉴学习型组织理论的一些有益观点与做法,把握以下几个基本要素:第一,确立共同愿景,明确党组织的学习目标和方向。确立共同愿景,有利于增强党员的主体意识、激发党员的学习热情,对党员加强自身学习和参与集体学习有很强的引导、激励作用。第二,加强团队学习,提高党组织的学习效率与学习水平。加强团队学习,有利于实现党员之间的知识共享,增强党组织的创新活力;有利于推动党员之间的沟通交流,形成党组织内部浓厚的学习氛围和民主的学习风气。第三,推动自我超越,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应大力营造积极进取的氛围,推动党员不断解放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奋发进取、开拓创新的良好精神状态;引导党员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提高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第四,促进系统思考,提高党员正确观察、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五,改善心智模式,提高党员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能力。

### 如何加强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建设

刘小平在《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撰文指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需要强化对

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的建设,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此,有必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坚持“四个结合”,建立和完善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首先,要坚持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相结合。其次,要坚持自上而下的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监督相结合。再次,要坚持合法性与合理性监督相结合。最后,要坚持监督权与选举权、罢免权相结合。二是健全组织法规和程序规则,保证国家权力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三是完善各类公开办公制度,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四是建立问责制度,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人财物管理使用、关键岗位的监督,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五是健全和完善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这是贯彻民主集中制,保证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正确性的关键。六是要尝试在执法、监督系统实行“条式”垂直领导管理体制,使其人财物相对独立。

### 系统总结经验是推进理论创新的重要前提

王海军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年第8期撰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也积累了丰富经验。系统总结这些历史经验,对进一步推动新形势下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新的实践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2.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思想武器和基本前提。3.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培养和塑造一支高素质的理论队伍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动力源泉和根本保证。4.不断从历史经验特别是自身发展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和营养,形成新的理论认识,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特征。5.不断根据实践要求进行创新,以理论创新的成果不断指导实践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和根本目的。6.站在时代前列,把握时代特点,深刻揭示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现实基础和价值趋向。

### “墨经”新解

尚杰在《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撰文指出,以往学界讨论墨辩之学更多关注墨子所持的观念和立场,而没考虑到墨子也是在用语言讨论语言。“墨经”亦称“辩经”,“辩经”亦称“语经”,就是说话的方向、辩论、说理、解释、论证的途径。它是中国式“解释学”或“语言哲学”,即如何把词语与语义连接起来。在这方面,透过形式逻辑的外表,墨经展开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中国式说理传统:与寻找第一原因的希腊哲学明显不同,特别在分类问题上,墨经展开了一种突破事物界限的横向分类方式;在“同异”问题上,由于墨经把隐喻和叠喻引入论证之中,从而具有离开形式逻辑同一律的倾向;在论辩的标准问题上,墨经以相对的彼此取代绝对的是非概念,是一种更为开放与灵活的说理方式。“墨经”还提示并没有所谓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谓“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空洞的大字眼,在它下面隐藏着多样思想,例如墨家与儒家思想有巨大差别,却与西方的所谓的“后现代哲学”有类似之处,这更进一步昭示不必截然划分属于中国或西方的“思想”,就像“物理学”思想不分东西方一样。